



任弼时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任弼时认为发展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抓住这一环节,“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演讲中他多处阐明经济建设与政权建设辩证关系。他说:“我们在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因此,他指出:边区应该在经济建设上“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在此,任弼时还根据毛泽东所作《经济问题财政问题》报告重申建设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至于如何搞好经济建设,任弼时在演讲中率先提出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必要性:“任务变了,工作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则中心任务的规改变而改变“,定是空洞的,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他强调:“和平建设工作与战争时期工作有其不同的内容,办法也就应有不同的一套,不能照老样办事”。经济建设工作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并且“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

为此,任弼时提出“必须打破公式主义”、“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要根据党的政策,从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大胆地去创造”,“独立地创造”;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对一般的官僚主义倾向“是应当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的”;对“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新的领导作风无法建立起来。

接着,他代表中共中央就重新审查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决定作了解释。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郑重宣布:“九一八以后,一直到遵义会议这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党的领导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占了统治地位。那个时候的错误路线性质,是一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而那个时期在各方面所执行的各种政策也都是‘左’的错误的。”这种错误路线统治时间长,“造成的恶果也就特别大,比陈独秀机会主义以及李立三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还要更大。如果用数目字来表示,就是苏区的工作损失了十分之九,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十分之十。”

由此,任弼时总结道:“如果思想方法不正确,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那是会要把革命弄失败的。”

最后,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因此,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是很仔细的,很慎重的。”每个在这一区域工作的党员和干部也就非常光荣。同时“你们两肩上所担负的责任都是非常重大的。”他热情地祝愿同志们能够愉快地胜利地完成建设“中央发言人地位的”陕甘宁边区的伟大任务!

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胜利闭幕。接下来的近半年时间,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这一重大任务,1943年3月16日,经过数月调查研究,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率先推出中央组织机构调整、精简的初步方案。

(212)

“副军长说得对!我还是听你的。”内心愧疚的刘胜,低着头轻声地说。

朱斌有电话来,梁波站到电话机旁边,边听边复述着:“地堡外面有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有鹿寨,鹿寨上绑着集团手榴弹,发现地雷,一个班上去,只回来四个……唔!攻不上去!”

梁波对着话筒喊叫着说:“先把鹿寨上的手榴弹消灭掉!用手榴弹消灭手榴弹,消灭地雷!然后再往上攻!……听到没有?不要猛打瞎冲!告诉下面,要动动脑筋……喂!喂!你说话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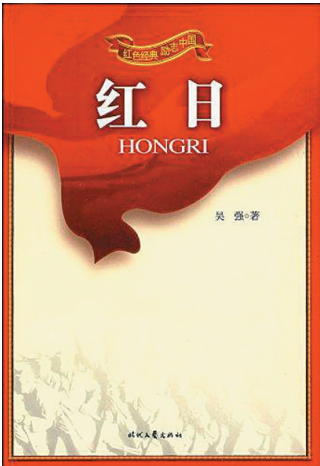
电话线断了,他吹吹话筒,继续地喊了几句,还是没有回话的声音。

“赶快叫人去查线!断了!”梁波对白玉生命令道。

白玉生抓住电话机的摇手,摇了好一阵,还是听不到声音,便急速地奔了出去。

“好吧!回去!准备好!说不定马上用得着你!”梁波摔掉手里的烟蒂,对刘胜说。

“还有什么意见么?”曹国柱向刘胜问道。



离罗马尼亚领土已经不远了,在一个富裕的小村子里,“锅圈儿”竟然从仓房里偷出一升大麦。主人当场把他连人带赃一起捉获,但是“锅圈儿”把老实、年高的比萨拉比亚人揍了一顿,大麦还是拿去喂马了。排长在拴马桩跟前找到了他。“锅圈儿”把饲料袋挂在马头上,在围着马打转儿,用哆哆嗦嗦的手抚摸着瘦骨嶙峋的马肋,对着它的眼睛看着,就像看一个人似的。“乌留平!你这个狗崽子,把大麦送回去!会为这桩事把你这个混蛋枪毙的!……”

“锅圈儿”用朦胧的、斜视的目光看了军官一眼,把制帽往脚底下一摔,从到团里来,第一次这样拼命大喊大叫道:“你们审判吧!你们枪毙吧!现在就把我打死,我也不送还大麦!……怎么,我的马就应当饿死吗?啊?我不送还大麦!一粒也不还!”

他忽而抓自己的头,忽而抓正在拼命咀嚼的馬的鬃毛,忽而抓马刀柄……

军官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那瘦得出奇、露出骨头来的马后腿,点了点头,说道:“你怎么能给出汗的马喂粮食呢?”

他的话音里明显流露出他那无可奈何的心情。

“不,马身上已经凉啦,”“锅圈儿”把从饲料袋里落到地上的麦粒捡到手裏,重新放回去,几乎是用耳语回答说。

十一月上旬,团队已经进入阵地。特兰西瓦尼亚群山顶上风在盘旋,山谷里冷雾弥漫,初寒袭过的松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山地洁白的初雪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野兽的趾印:被战争惊骇的狼、麋鹿、野山羊,离开了荒野山林,逃往内地去了。十一月七日,第十二团向“三二〇”高地发起进攻。前一天本来是奥地利人据守在这条战壕里,可是在发动进攻的那天早晨,刚从法国前线上调来的

“没有!”刘胜回答道。

刘胜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激动地对梁波和曹国柱说:“保证照首长的指示执行!候命行动!”

走到门口,警卫员邓海告诉他,马已经送来,他像没听见似的,默默地走了好一段路,才跳上他的白马。

刘胜一进屋子,电话机就“叮叮当当”地吵闹起来。他抓起话筒,又是三营营长黄弼,询问消息怎么样,说下面有意见,要求任务,几个连长、指导员坐在营部,要求他打报告、写请战书等等,刘胜干脆地回答说:“睡觉吧!同志们!仗有得打的!报告,我已经当面向师首长、军首长打过了!”他重重地放下话筒,紧接着,电话机又吵闹起来。

“叫你们睡觉!仗有得打的!不要再打电话来跟我麻烦!”电话里说:“老刘吗?怎么有点生气的样子?”

“是陈政委吗?”刘胜失悔地问道。

“是呀!”陈坚回答道。

“我以为又是黄弼哩!嘿嘿嘿嘿!”刘胜歉然地笑着说。

“到师部指挥所去听到什么消息吗?”

“给副军长狠狠地上了我一课!”陈坚放下话筒,急忙地走到刘胜的屋子里来。笑着问道:“上了什么课?”

“军事课加政治课。上得好,吃了批评,心里舒服!”

刘胜把他和梁逼军长、曹师长谈话的经过情形,扼要地复述一下以后,对陈坚说:“这个敌人还不是好打的家伙哩!每一间屋、每一个碉堡都要拼命争夺!看样子,我们这个预备队还真的要预备上哩

邓海走到面前问道:“酒拿来吗?”“什么酒?”刘胜反问道。“不是你到师部去的时候,叫搞的?”“噢——!不吃了!”

撒克森人接替了他们。哥萨克们都徒步沿着覆了一层薄雪的石头山坡前进。冰冻的碎石碴在脚下滚动,风卷起阵阵的细雪。葛利高里和“锅圈儿”并排走着,遗憾地、不好意思地笑着对他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很害怕……好像是头一次去冲锋似的。”

“是吗?……”“锅圈儿”觉得很奇怪。

他揪着枪带,端着自己那支破旧的步枪;舌头不断地从胡子上往下舔冰凌。哥萨克们排成不整齐的散兵线向山上推进,没有开枪。敌人的战壕里死一般的沉寂,令人生畏。山坡的后面,德国人那边,一个萨克森人中尉,脸被风吹得通红,鼻子也脱了皮,身子向后仰着,面带微笑,激愤地对士兵们喊叫道:“朋友们!咱们打穿蓝大衣的俄国佬,已经不是第一次啦!咱们也叫这些家伙们看看,跟咱们打仗会有什么好下场。多忍耐一会儿!现在不要开枪!”

哥萨克连队开始突击。脚下迸起松脆的石碴。葛利高里神经质地笑着,掖了掖已经褪成红褐色的风帽的长耳,他那凹陷的两颊了很久没有刮的连鬓胡子简直就像地里剩下的黑麦茬子,下垂的鼻子黄中透着青光,眼睛像无烟煤似的,在结满白霜的眉毛下阴沉沉地闪烁着。他已经失去了惯常的镇静。压制着内心突然又冒出的恐惧心情,他眯缝着眼,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撒了一层雪花的灰白的战壕,对“锅圈儿”说道:“鸦雀无声。他们是放我们走近再打。我确实害怕,可是并不惭愧……要是我转身往后跑会怎样?”

“你今天怎么尽说胡话呀?”“锅圈儿”怒气冲冲地问。“亲爱的,这也跟打牌一样:你要是没有信心——就要掉脑袋。你的脸焦黄。葛利什卡……你也许病

“我看也是不吃的好!”邓海咕嘟着走了出去。

看到刘胜的情绪有了变化,比到师部指挥所去以前安定、愉快得多。陈坚有些不安的心,也就平静下来。

二三蒋介石匪军新编三十六师师长何莽,愤怒地躺在地下室的破藤椅上。地下室入地八尺,一丈二尺见方大小,墙壁上挂满了地图。报话机、电话机旁边,坐着,立着一小群人,因为师长刚刚暴跳如雷地发了一顿脾气,他们有的伸长舌头,有的挤眉弄眼,有的则是哭丧着沾满污垢的脸。

由于他的身体突出的肥大沉重,破藤椅的四只瘦腿,深深地陷入到泥土里,发着痛苦的“吱吱呀呀”的惨叫声。

“是哪一团、哪一营、哪一连、哪一排丢掉土地庙旁边大地堡的?跟我查清楚,叫他们的排长提头来见我!”

“一〇七团二营五连三排,排长带重花。”一个瘦脸参谋嗫嚅着回答说。

“带花?能爬叫他爬得来!不能爬,把他抬得来!”何莽暴怒地叫道。向参谋瞪着眼睛,他的黄眼珠几乎凸到眼眶外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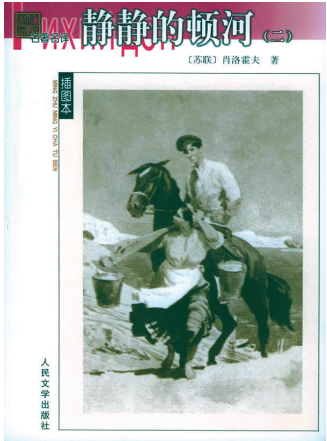
参谋犹疑了一下,在何莽凶狠的眼光之下,急促地走了出去。

这是作战第二天的深夜里,枪、炮正打得猛烈,房屋的墙壁不时地倒塌下来。屋顶的瓦片上跳着火花,瓦片“咯咯喳喳”地狂叫乱飞。

参谋穿过蛇形的交通沟,跌跌撞撞地走了一段高低不平的小路,忽然摔倒在一堆软塌塌的障碍物上。他呆愣了一会,正要爬起身来,腿上给什么东西猛烈地戳了一下,同时听到恶的叫骂声:

“你祖宗受了伤,你还要来踩!你怕我不死!让你也尝尝滋味!”

(53)



啦,也许……今天会把你打死。你快看呀!看见了吗?”

一个穿短大衣、戴尖顶钢盔的德国人直着身子在战壕上站了一刹那,又趴了下去。

葛利高里的左面,是个叶兰斯克镇的浅红头发的漂亮哥萨克,他一面走,一面忽而把手套从右手上扯下来,忽而又戴上上去而且在不断地重复这个动作。他急急忙忙地迈脚步,膝盖费劲地打着弯儿,还故意大声咳嗽。“像是独自一人在走夜路……为了壮胆儿,故意咳嗽,”葛利高里心里琢磨着这个人。这个哥萨克的左面,可以看到满脸雀斑的下士马克萨耶夫的半边面颊,再过去,是叶梅利扬·格罗舍夫,他牢牢地端着刺刀尖歪到一旁去的步枪。葛利高里想起来,几天前,叶梅利扬在行军路上,正是用这把刺刀撬开仓房的锁,偷了罗马尼亚人一口袋玉米。科舍沃伊·米哈伊尔几乎与马克萨耶夫并肩走着。他拼命地抽烟,隔一会儿就擤擤鼻涕,在军大衣的左襟上擦擦手指头。

(202)